

## 第二章 《女帝奇英傳》的創作淵源

一部作品的誕生，絕對不是無中生有、空穴來風，作者在創作之初，必定受到某種人、事、物的啟發及影響，選擇創作的時空背景，歸納並分析所得的啟發及影響，再加上作者個人的經驗，最後才完整地呈現在眾人面前。因此，本章就《女帝奇英傳》之內容分析，將分別就：古代文史素材的媒介、前人經驗的啟發及作者個人經驗的影響，這三方面，探討《女帝奇英傳》的創作淵源，茲分三節，分述如後。

### 第一節 古代文史素材的媒介

梁氏作品的一大特點即武俠小說兼有歷史之長。梁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，具有相當強烈的歷史使命感，幾乎沒有任何一部作品沒有明確的歷史背景，《女帝奇英傳》中的歷史背景即是武則天稱帝的時代。其中採用了許多的文史素材，而這些文史素材則是構成此部小說的重要媒介，在此分為歷史素材與文學素材兩方面，分述如下。

#### 一、歷史素材

歷史素材又可分為編織史實與合乎史實兩方面。編織史實則是為了配合情節需要，梁氏將史實重新編織，雖與史實不符，對整個情節結構卻有穿針引線之功；合乎史實即是將歷史掌故引用於故事情節中，不加修改，試就二端分述如下：

##### （一）編織史實方面

在 第一回 量才玉女驚身世 中，即點出了《女帝奇英傳》的歷史背景：

兩兄妹一笑罷手，從架空的棧道上跳下來，長孫璧道：「你整天只是掛著做詩，再過幾年，只怕王、楊、盧、駱四位大詩家見到你，也要拱手臣服了。」王是王勃，楊是楊炯，盧是盧照鄰，駱是駱賓王，並稱初唐四傑，詩名籍甚，風靡一時。（第一回，頁三。）

王、楊、盧、駱四人並稱初唐四傑，經四人的努力，使得詩歌逐漸擺脫六朝華艷風習。從長孫璧說的話中可以得知，當時初唐四傑都還在世，四人中以王勃的才情最高，但享年卻最短，於西元六七六年就因溺海而死，以二十八歲英年早逝。主角之一的上官婉兒也覺得王勃的才華較好，由以下敘述可知：

上官婉兒卻似意殊不屑，微笑說道：「四傑之中，王勃小有才華，其他三人也不見若何特出，尤其那駱賓王，最喜用數字入詩，故意賣弄，什麼『秦塞重關一百二，漢家離宮三十六。』什麼『小唐綺帳三千萬，大道青樓十二重。』囉哩囉嗦，我最不喜歡。他的文章比他的詩好得多。」（第一回，頁三。）

可見上官婉兒對本身的才華相當有自信，故長孫璧咋舌笑道：

好大的口氣，當今皇帝在位，聽說要開設女科，這個自古以來的第一個女狀元，必將非你莫屬了。（第一回，頁三。）

這句話雖然說明了武則天有意開設女科取才，但在時間上卻與史實有所出入，因為長孫璧談到初唐四傑之時，四人仍然在世，王勃最早逝於西元六七六年，楊炯最後殞落於西元六九三年，武則天改唐為周，稱聖神皇帝則為西元六九一年之事，而長孫璧與上官婉兒的對話應在西元六九一年之前才是，故長孫璧所說：「當今皇帝在位」，在時空上不盡相符。

接著又藉章懷太子李賢被貶巴州的史實，將上官婉兒、長孫泰及長孫璧三人帶出了隱居

的劍閣：

長孫均量道：「什麼，太子竟在巴州？」李元道：「章懷太子已被廢了，被貶巴州，也將近半年了。」長孫均量恨恨說道：「先太子被毒，今太子被廢。哼哼！虎毒不食兒，看來武則天的心腸，竟比虎狼還狠！」（第一回，頁一〇。）

司馬光所撰《資治通鑑》中有記載：

太子弘仁孝謙謹，上甚愛之；禮接士大夫，中外屬心。天后方逞其志，太子奏請，數忤旨，由是失愛於天后。義陽、宣城二公主，蕭淑妃之女也，坐母得罪，幽於掖庭，年踰三十不嫁。太子見之驚惻，遽奏請出降，上許之。天后怒，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翎衛權毅、王遂古。己亥，太子薨於合璧宮，時人以為天后酖之也<sup>1</sup>。

根據《資治通鑑》記載，太子李弘禮賢下士，甚得人心。當時武后權位尚未穩固，而太子卻「數忤旨」，甚至欲釋放蕭淑妃的二個女兒，該年太子即薨於合璧宮，在此形勢之下，時人多以為武后為幕後元兇。時隔五年，太子李賢又因崇儼被刺死，遭武后猜疑，被廢為庶人：

太子賢聞宮中竊議，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，內自疑懼。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，常密稱「太子不堪繼承，英王貌類太宗」，又言「相王相最貴」。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，又數作書誚讓之，太子愈不自安。及崇儼死，賊不得，天后疑為太子所為。甲子，廢太子賢為庶人<sup>2</sup>。

以及：

<sup>1</sup> 見司馬光《資治通鑑 唐紀十八》，第十一冊，卷二〇二。高宗上元二年條（西元六七五年）（台北：建宏出版社，一九七八年。），頁六三七七。

<sup>2</sup> 見司馬光《資治通鑑 唐紀十八》，第十一冊，卷二〇二。高宗永隆元年條（西元六八〇年）（台北：建宏出版社，一九七八年。），頁六三九七。

十一月，癸卯，徙故太子賢於巴州<sup>3</sup>。

史書所記載的真實性有待考據，畢竟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鑑》中也說是「時人以為天后醜之也」，梁氏藉此記載，順水推舟將上官婉兒、長孫泰及長孫璧三人導入另一個情節。

上官婉兒是真有其人，祖父上官儀因恐武則天的權勢日益坐大，而上言高宗將其廢之：

初，武后能屈身忍辱，奉順上意，故上排群議而立之；及得志，專作威福，上欲有所為，動為后所制，上不勝其忿。有道士郭行真，出入禁中，嘗為厭勝之術，宦者王伏勝發之。上大怒，密召西臺侍郎、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。儀因言：「后專恣，海內所不與，請廢之。」上意亦以為然，即命儀草詔。左右奔告於后，后遽詣上自訴。詔草猶在上所，上羞縮不忍，復待之如初；猶恐后怨怒，因給之曰：「我初無此心，皆上官儀教我。」儀先為陳王諮議，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，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、伏勝與忠謀大逆。十二月，丙戌，儀下獄，與其子庭芝、王伏勝皆死，籍沒其家<sup>4</sup>。

上官婉兒的祖父及父親為武則天所害，全家被沒入宮中為奴，至十四歲時，始被武則天發現其才，命為紀室，十分重用：

上官昭容者，名婉兒，西臺侍郎儀之孫。父庭芝，與儀死武后時。母鄭，太常少卿休遠之姊。婉兒始生，與母配掖廷。天性韶警，善文章。年十四，武后召見，有所制作，若素構。自通天以來，內掌詔命，掞麗可觀。常忤旨當誅，后惜其才，只黥而不殺也。然群臣奏議及天下事皆與之<sup>5</sup>。

<sup>3</sup> 見司馬光《資治通鑑 唐紀十八》，第十一冊，卷二〇二。高宗開耀元年條（西元六八一年）（台北：建宏出版社，一九七八年。），頁六四〇五。

<sup>4</sup> 見司馬光《資治通鑑 唐紀十八》，第十一冊，卷二〇二。高宗麟德元年條（西元六六四年）（台北：建宏出版社，一九七八年。），頁六三四二。

<sup>5</sup> 見歐陽修、宋祁《新唐書 后妃列傳上》，卷七十六。（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一九七七年。），頁三四八八。

梁氏未依循史實，將上官婉兒未被武則天發現之前的七年，寫成避難於長孫均量之家，而非是在宮中為奴七年始被發現，實是為了情節的需要，兼以上官婉兒幼負詩名，卻至十四歲才被發現，故以此疑點作為轉折。

在第三回中，流放巴州的廢太子李賢，被左金吾將軍丘神勳的部下所殺害，與史實不相符：

丘神勳至巴州，幽故太子賢於別室，逼令自殺。太后乃歸罪於神勳，戊戌，舉哀於顯福門，貶神勳為疊州刺史。己亥，追封賢為雍王。神勳尋復入為左金吾將軍<sup>6</sup>。

根據史料記載，廢太子李賢雖為左金吾將軍丘神勳所逼殺，但被貶官一年即官復原職，可知內情不單純。史料中並未明說此事為武后所做，但暗喻卻直指武后，梁氏即根據此一疑點，寫為丘神勳的部下所做，而丘神勳的部下卻是受中書令裴炎所指使，並與英國公徐敬業舉兵討武串連起來：

程務甲道：「英國公密謀舉兵，約好了裴炎作內應。裴炎差遣我們刺殺太子，一來可使天后陛下蒙受惡名，二來可令陛下猜疑丘大將軍，三來令陛下有失子之痛，無心再理國事。」（第七回，頁一四一。）

根據史書記載，廢太子李賢原為丘神勳所逼殺，此處為了情節上的需要，故改為裴炎指使部下所殺，以串連英國公徐敬業舉兵一事：

時諸武用事，唐宗室人人自危，眾心憤惋。會眉州刺史英國公李敬業及弟整屋令敬猷、給事中唐之奇、長安主簿駱賓王、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，敬業貶柳州司馬，敬猷免官，之奇貶栢倉令，求仁貶黟令。求仁，正倫之姪也。整屋尉衛思溫嘗為御史，復

<sup>6</sup> 見司馬光《資治通鑑 唐紀十九》，第十一冊，卷二〇三。則天后光宅元年條（西元六八四年）（台北：建宏出版社，一九七八年。），頁六四一九。

被黜。皆會於揚州，各自以失職怨望，乃謀作亂，以匡復廬陵王為辭<sup>7</sup>。

英國公徐敬業等多人，因當時諸武用事，被貶失職，眾人心中怨忿，而有揚州舉兵討武之舉。文本中「中書令裴炎作內應」之說，實為作者為增強英國公徐敬業舉兵的「師出有名」，其實，裴炎是一個勇於勸諫的人，卻因此被誣謀反，招致殺身之禍：

太后問計於炎，對曰：「皇帝年長，不親政事，故賢子得以為辭。若太后返政，則不討自平矣。」

鳳閣舍人李景謚證炎必反。

丙申，斬裴炎于都亭<sup>8</sup>。

廢太子李賢被殺、英國公徐敬業舉兵討武及裴炎被誣殺等三事，先後於同一年發生（西元六八四年），只是三事並不相關，廢太子李賢可能間接死於武后之手，徐敬業舉兵是為了失職怨忿，裴炎則是因直言道破武后的陰謀而被誣殺，文本中是為了情節需要而將三事串連起來。

## （二）合乎史實方面

就在上官婉兒拜別長孫均量後，隻身由劍閣往巴州的途中，遇到一位賣茶的老人，老人的一番話卻使其報仇意念產生了些許動搖：

我們老百姓不管誰做皇帝，男的也好，女的也好，但求日子過得稍微好些，就心滿意足。以前收割一石穀子要納三斗租稅，現在只要一斗半，比以前少了一半哩。最好的是，現在不準富豪之家強賣強買，不論你怎樣窮，一份口分田總是有的，只要勤耕善織，日子也就可以對付過了。（第一回，頁三〇。）

<sup>7</sup> 同註 6，頁六四二三。

<sup>8</sup> 同註 6，頁六四二五 六四二七。

我國自古以來即是以農立國，知識份子反對女性專政，但農民的心中究竟如何想，卻是很少人去關心，所以只要老百姓日子過得溫飽，皇帝是男或是女就不是那麼重要了。賣茶老人說的話是有根據的：

在發展經濟中，武則天像前代統治者一樣，把農業生產放在首位。她在「建言十二事」中，把「勸農桑，薄賦徭」列為第一條，並由高宗詔令全國施行。她把「田疇墾闢，家有餘糧」和「為政苛濫，戶口流移」，作為地方官員的主要標準。她還組織她的「北門學士」編寫農書《兆人本業》，頒發全國各地，以指導農業生產。在她當政期間，在今天的陝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山東、湖南、四川、浙江、江蘇、甘肅、青海、內蒙古等地，興修了大小不等的許多水利工程，最大的工程流經幾個省，可灌溉農田九萬多畝<sup>9</sup>。

在武后未稱帝之前，她就深知「勸農桑，薄賦徭」的重要性，對廣大的農民百姓來說，可說是如魚得水，因此，務農維生的老百姓自然歡喜，反而希望武則天能多活幾年。

關於武則天的「荒淫無道」，當時受到知識份子的競相指責，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卻非如此，梁氏更藉由賣茶老人的口中為武則天辯白：

以前的男皇帝除了三宮六院，還有無數宮娥，每三年還要挑選秀女，哈，那時候每逢挑選秀女之期，可把我們害慘啦，做父母的忙著嫁女兒，還得應付官府的勒索。現在女皇帝，縱算她養了幾個漢子，總沒有挑選秀男呀！（第一回，頁三一—三二。）

這幾句話說來不無道理，但在知識份子心中卻是「荒淫無道」，實在有欠公道。對武則天尚有「殘暴、亂殺人」惡名加身，但在老百姓看來卻又是另一番情境：

<sup>9</sup> 見宋昌斌《盛唐氣象——唐朝興衰啟示錄》（台北：年輪文化，一九八八年。），頁一八四。

說到亂殺人嘛，聽說她殺的都是王孫貴族，或者做大官的人。別處地方我不知道，在咱們這個縣子裡，幾年來倒沒有聽說殺冤枉過一個老百姓。倒是三年前有一個貪官叫曾剝皮的被她殺了。（第一回，頁三二。）

又在第二回裡，話說有個張老三，因為未過門的媳婦被一個惡霸搶了而上京告密，沿途都受五品官待遇，乃是武后的命令，凡進京告密者，都受官府保護：

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，詔許上變，在所給輕傳，供五品食，送京師，即日召見，厚餽爵賞款動之。凡言變，吏不得何詰，雖耕夫蕘子必親延見，稟之客館。敢稽若不送者，以所告罪之<sup>10</sup>。

武后恐因久專朝政而招來反逆，因而獎勵告密，施行酷吏政治，在老百姓與知識份子看來，感受竟相去十萬八千里，或許這僅是梁氏個人的評論，但武則天是否真的「荒淫無道」且「殘暴、亂殺人」，個人也不敢作評論，還是留待史家去考證吧！

在第七回中，狄仁傑的名字首度出現，在史料上，狄仁傑是武后最信任的大臣，武后尊稱仁傑為「國老」，仁傑常諫諍，挽回武后許多不當的措施，維護太子，安撫四夷，收拾人心，對安定政局，功勞很大。則天后久視元年（西元七〇一年）仁傑病死，武后哭道：「國老逝，廟堂空矣！」

只聽得武則天往下續道：「我的姪兒武三思雖然也不是什麼有才能的人，但好像比我這幾個寶貝兒子稍微好些，我將立他為皇嗣，你看怎樣？」狄仁傑道：「陛下立嗣，臣子本不該干預。但請陛下三思，自古以來，祇有兒子做了皇帝之後，母后可入祀太廟；未聞有姪兒做了皇帝，姑母可以入祀太廟的。」（第七回，頁一四四。）

---

<sup>10</sup> 同註5，頁三四七九。



在《資治通鑑》中，確實記載了狄仁傑的諫言：

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：「文皇帝櫛風沐雨，親冒鋒鏑，以定天下，傳之子孫。大帝以二子託陛下。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，無乃非天意乎！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？陛下立子，則千秋萬歲後，配食太廟，承繼無窮；立姪，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。太后曰：「此朕家事，卿勿預知。」仁傑曰：「王者以四海為家，四海之內，孰非臣妾，何者不為陛下家事！君為元首，臣為股肱，義同一體，況臣備位宰相，豈得不預知乎<sup>11</sup>！」

由文本第七回與《資治通鑑》中武后與狄仁傑的對話可知，狄仁傑雖然位居內吏高位，卻不似其他人逢迎度日，反能仗義執言，甚至影響了武后立嗣的決定，居功厥偉。

## 二、文學素材

在第二回中，作者引用初唐詩人陳子昂的 登幽州臺歌：

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。

則天后垂拱元年（西元六八五年），陳子昂官居麟臺正字，曾經積極表現改革政治的熱情<sup>12</sup>，從軍出塞時，寫了這首 登幽州臺歌，但最後仍是壯志未酬，被迫而死。作者藉由這首詩，來說明《女帝奇英傳》中的男主角李逸，因為憂心國家被武后所把持，自己又孑然一身，一事無成，縱有憂國憂民之心，卻無從發揮而嘆氣連連。上官婉兒聽了感到心有戚戚焉，不自覺地撫琴歌道：

<sup>11</sup> 見司馬光《資治通鑑 唐紀二十二》，第十一冊，卷二〇六。則天后聖曆元年條（西元六九八年）（台北：建宏出版社，一九七八年。），頁六四二六。

<sup>12</sup> 見司馬光《資治通鑑 唐紀十九》，第十一冊，卷二〇三。則天后垂拱元年條（西元六八五年）（台北：建宏出版社，一九七八年。），頁六四三六。

烽火照西京，心中自不平。牙璋辭風闕，鐵騎繞龍城。

雪暗凋旗畫，風多雜鼓聲。寧為百夫長，勝作一書生。

這首詩實引自楊炯 從軍行，風格雄渾，情感激揚，抒發了一個慷慨從戎的愛國者的理想，李逸聽了之後，本來感傷的情緒，頓時豁然開朗，並表明了身為大丈夫，豈能甘作個百無一用的書生，而自當金戈鐵馬，縱橫天下！

在第八回中，李逸因「傷心宇內英豪盡歸新主，忍令天京神器竟屬他家？」心中一腔鬱悶，難以排遣，引用了《詩經·黍離》一篇中的句子：

彼黍離離，比稷之苗。行邁靡靡，中心遙遙。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。

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？

黍離 一篇本是說周室東遷之後，大夫行役，經過舊日京都，見宮廟宗室，盡為禾黍，憫周室之顛覆，徬徨不忍離去。李逸正是想起故國，因而悲傷改唐為周之後的長安宮殿，是否已成黍地禾田？這幾句卻是與主角的感受頗為相類。

在第九回中，武玄霜以屈原所作《九歌·湘君》一篇的句子來探問李逸的心事：

君不行兮夷猶。蹇誰留兮中洲？美要眇兮宜修，沛吾乘兮桂舟。

原意是說：「你有什麼心事猶豫不前，是不是想念一位妙麗的佳人，若是那樣，就該催桂木做的船快走啊。」李逸見自己的心意竟被猜到，只好以《詩經 國風 邶風 柏舟》中的句子撫琴歌道：

日居月諸，胡迭而微？心之憂矣，如匪澆衣。靜言思之，不能奮飛。

意思是說：「一個胸懷大志的人，被群小所制，不能奮飛，又不甘退讓，懷著滿腔憂鬱，無可告語。」李逸自比為「不可奮飛」的「君子」，境況相同，情真意切，滿腔憂憤，都從琴聲中發洩出來。又歌道：

綠兮衣兮，綠衣黃裳。心之憂矣，曷為其亡！綠兮絲兮，汝所治兮，我思故人，俾無訖兮。

本意是說詩人睹物思人，思念故妻。李逸卻藉此詩意來懷念他的知己上官婉兒，因為上官婉兒去行刺武則天，定然凶多吉少。武玄霜聽了也撫琴歌道：

芳與澤其雜糅兮，羌芳華自中出，紛郁郁其遠承兮，滿內而外揚。情與質信可保兮，羌居蔽其聞章。

此歌出自楚辭《九章 思美人》，她把上官婉兒比作傑出的香花，終必能夠從凡花之中把自己分別出來，懂得好壞，識得是非，由於她美好的品質，她絕對不會被埋沒，也就是說她必然會給武則天賞識的了。李逸聽了，好像上官婉兒將來終會與他背道而馳，不覺惘然。之後，李逸在夏侯堅處養傷，待傷漸痊癒時，以是初秋時分，心中所想的卻不只上官婉兒一人，還多了一個武玄霜，心亂如麻，於是彈了自己最喜歡《離騷》中的句子，歌道：

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！

原意是說：「歲月匆匆地留是，春秋更迭時節變易。暗想一年一度草木凋零，唯恐君王徒然地衰頹老邁。」懷念遠人，不能自己的心情，都一併寄託在琴聲歌賦中了。

《女帝奇英傳》中的文史素材成了情節交替不可或缺的媒介，既有武后專政的歷史背景，

又有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及初唐詩人的詩賦來映襯，雖然有些歷史事件並非與史實相符，但為了內容情節需要而稍事修改，也是無可厚非。

## 第二節 前人經驗的影響

梁氏能成為「新派武俠小說」的開山祖師，受到前人的啟發不少，因此，本節將探討《女帝奇英傳》在創作之時，究竟受到前人經驗中哪些方面的啟發。

梁羽生，本名陳文統，一九二四年四月五日出生，廣西蒙山縣人。作者於舊派武俠小說家之中，最欣賞的人就是「白羽」，本身又曾以「梁慧如」的筆名寫過許多散文、文藝評論和文史隨筆，據說「梁羽生」的名字就是由「梁慧如」、「白羽」所變化而來的。本節將前人經驗的影響分二課題來論述：名士派文人風格的影響，以及舊派武俠小說家的影響。

### 一、名士派文人風格的影響

梁氏曾用「佟碩之」的筆名發表了一篇《金庸梁羽生合論》，提到了自己所受到的影響，他說：

梁羽生是名士氣味甚濃（中國式）的<sup>13</sup>。

至於傳統文化的影響方面，他則說：

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（包括詩詞、小說、歷史等）的影響較深<sup>14</sup>。

<sup>13</sup> 見佟碩之（梁羽生）《金庸梁羽生合論》，收錄於《梁羽生的武俠文學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一九八八年。），頁一一四。

<sup>14</sup> 同註 13。

在《女帝奇英傳》中，不論是男女主角，幾乎人人都有相當的文學造詣，每逢情緒起伏之際，總是能隨口吟唱詩詞，有的是借用他人的作品，有的是作者所自創。每一回的開頭皆有回目，用舊回目的武俠小說家很少，雖然不是每個回目都很工整，但仍是時有佳作，回目中充滿了詩詞的氣息。姑且不論這些詩詞的素質良窳，從文本的人物中可以發現，除了絕妙的武技之外，更處處流露出一派名士風範，這種濃厚的中國式名士氣息，必然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極深。梁氏曾說：

清末四大詞人，我們廣西竟占其二哩<sup>15</sup>！

他說的是王半塘（西元 1848—1904 年）和況蕙風（西元 1859—1925 年），都是廣西臨桂人，王半塘的詞寫得「氣勢宏闊，籠罩一切」，而況蕙風的詞則「寄興淵微，沉思獨往」。梁羽生原籍廣西蒙山縣人，雖與王、況兩人素未謀面，但卻也是間接影響梁氏的前輩詞人之一。在梁氏的成長過程中，眾多影響他的詞人之中，最重要的當推他的外祖父莫屬了！

梁氏的外祖父名叫劉瑞球，字劍笙，是前清的舉人。其外祖父年輕時曾留學日本學習軍事，回國後任軍官職，辛亥革命之後，無心政治，遂歸隱廣西蒙山，對棋藝詩詞多所涉獵，過著傳統名士生活。在如此的環境中，耳濡目染，使得年幼的梁氏具備了相當的古典詩詞功底。九歲時，家來了一位客人，想要考考年幼的梁氏，出了一句上聯：

老婆吹火筒

沒想到，年幼的梁氏不加思索便答道：

童子放風箏<sup>16</sup>

<sup>15</sup> 見《梁羽生的武俠文學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一九八八年。），頁十一。

<sup>16</sup> 同註 15，頁十。

小小年紀便能有如此反應，可見梁氏平時即背誦了許多詩詞佳句。

西元一九四三年，正值梁氏的少年時期，當時正處於抗日戰爭期間，一批學者避難至廣西蒙山，也就是梁氏的家鄉。十八歲的梁氏感慨家國興亡，賦了一闕詞《水龍吟》：

湘戰失利，八桂騷然，感而倚此。

洞庭湖判斜陽，而今空照銷魂土。潸然北望，三湘風月，亂雲寒樹。屈子猶狂，賈誼何在？溫新亭淚。恨殘山剩水，亂蟬高柳，淒咽斷，瀟湘淌。又是甲申五度，聽聲聲，病猿啼苦，滿地捐塵，誰為可法？橫江擊鼓。覓遍桃源，唯有蒙城，烽煙猶阻，問甚日東風，解凍吹寒，催他冬暮<sup>17</sup>。

因為這一闕詞，使得梁氏受到其中兩位學者的賞識，一位是研究太平天國史權威的簡又文教授，另一位則是曾獲法國漢學獎的饒宗頤教授。之後，梁氏以中國傳統拜師儀式拜簡又文為師，從簡又文處習得中國歷史，又從簡夫人處學會英文，既得中國文化的精隨，又取得開啟西方現代文明的鎖鑰——英文，加上饒宗頤教授對他的古典詩詞造詣影響頗大，此時的梁氏不僅史學及詩詞的根底更加扎實，視野也更加宏觀了！

西元一九四五年，梁氏進入嶺南大學，讀的是國際經濟，但他的興趣卻是文史方面。所幸他的朋友與老師之中，有幾位文史專家，簡又文教授也在那任教，大家常聚在一起吟詠詩詞，日子過的倒也充實。梁氏在嶺南大學的這四年，正是近代中國歷史重大轉折期，國共之間的戰爭不斷，使得每個中國人都必須做出選擇，頓時讓他感到學習國際經濟的前景是渺茫的。不過從他當時的詞作及日後的武俠小說作品中，青年時的梁氏是充滿了強烈的愛國情操，並期望祖國的和平與繁榮。

《女帝奇英傳》中的李逸，雖然是一個落魄的王孫，其言談舉止仍是一派名士風範，但最後卻成令人傷感的悲劇人物。梁氏武俠小說中的名士型俠客，總是或多或少帶有一些悲劇色彩，乃是受到清代詞人納蘭容若和文壇怪傑龔定庵的影響。納蘭容若與龔定庵都是性情中

<sup>17</sup> 見龍飛立 劍氣蕭心梁羽生，收錄於《梁羽生的武俠文學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一九八八年。），頁三四。

人，作品每多直抒胸臆、不假藻飾的倜儻風情，而又不失其韻致纏綿、晶瑩的文章特質。王國維在《人間詞話》中，即曾盛稱納蘭容若的作品：

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，此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漢人風氣，故能真切如此，北宋以來，一人而已<sup>18</sup>。

梁氏將納蘭容若的詞意帶入新派武俠小說中，使武俠小說不再只以刀光劍影與武術取勝，而展現了另一片清新圓融的天地，不能不說是武俠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大突破。至於龔定庵，本身就是一個介乎儒與俠之間的人物，詩中本來就充滿俠氣。梁氏早期在雜文集《三劍樓隨筆》中，經常引述龔氏《己亥雜詩》中的詩句：

少年彈劍復吹簫，劍氣蕭心一例消，誰分蒼涼歸棹後，萬古哀樂集今朝<sup>19</sup>。

因此，梁氏的作品中，經常有像龔定庵一般的名士型俠客，如彗星一般掠過血腥與權謀交織而成的歷史舞台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納蘭容若與龔定庵都是清新俊逸的文學人物，在複雜詭譎的現實社會中，固然不容易安身立命：在情仇糾結的江湖風波中，同樣不容易尋得樂土，所以梁氏筆下的新派武俠作品裡，正派主角往往都帶有一絲若隱若現的悲劇色彩，正是名士派文人的風格所影響。

## 二、舊派武俠小說家的影響

活躍於三十年代的北派五大家，他們在前人的基礎上各出機杼、創新突破，而分別建立了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，完善了武俠小說形式與內容的統一，卒能將其故事趣發揮無遺。這

<sup>18</sup> 見李永平《梁羽生作品的悲劇美感》，收錄於《梁羽生的武俠文學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一九八八年。），頁九八。

<sup>19</sup> 同註 18，頁九十八。

就是「奇幻仙俠」 還珠樓主、「社會反諷」 白羽、「悲劇俠情」 王度廬、「幫會技擊」 鄭證因、「奇情推理」 朱貞木，北派五大家的勃興，影響了近五十年來武俠小說的發展方向與走勢，梁氏自然也受其影響。武俠小說評論家曹正文先生評述說：

歸納起來說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在繼承舊派武俠小說基礎上有所發展，在作品主題上，他提高了俠的主題意識以及俠義對社會的影響，與人們的聯繫。在人物形象上，他筆下的大俠，較之民國的俠客站得高，看得遠。在文字上，梁羽生走的是典雅名士派風格，但反映的卻是社會現實的畫面。並通過情景描繪，加強了文學作品的審美意識，並有機地把傳統文化思想與民俗民情融合為一體<sup>20</sup>。

梁氏在舊派武俠小說的基礎上，將「俠」的主題意識更加昇華，增添了對國家社會的關懷，也聯繫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；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，強烈的使命感驅使著他，不僅強化了武俠文學的美感，也將傳統文化與各地風俗民情結合，開創了武俠小說的新境界。另一位武俠小說評論家葉洪生說：

所謂「北派五大家<sup>21</sup>」是只活躍於華北文壇而成名於三十年代五位武俠小說巨擘 還珠樓主、白羽、鄭證因、王度廬、朱貞木<sup>22</sup>。

依據以上兩位武俠小說評論家的評述，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，梁氏既身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師，其武俠小說理應承繼了舊派武俠小說的基礎，並依此基礎來開展他的新派武俠小說版圖。香港記者葉黎明到澳洲訪問梁氏時，他曾說：

那時候舊派武俠小說已經沒落，人們也不把它當作正統文學，香港報刊登的武俠小說

<sup>20</sup> 見曹正文《俠文化》(台北：雲龍出版社，一九九七年。)，頁一五七。

<sup>21</sup> 張贛生於所著的《中國武俠小說的形成與流變》中，曾首倡「北派四大家」之說，而將朱貞木排擯在外，葉洪生覺得似乎有欠持平，故立新界說。

<sup>22</sup> 見葉洪生《武俠小說談藝錄》(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一九九四年)，頁四四。



水準更低，文字半文半白，缺乏人物性格的刻劃，所以我亦很少看。有時會看中國大陸的名作家如白羽、還珠樓主等素質較高的作品，但對武俠仍不太欣賞<sup>23</sup>。

「北派五大家」的武俠小說盛於三十年代，於四十年代漸趨沒落，當時的梁氏雖然曾看過白羽、還珠樓主等的作品，但本身對於武俠小說仍不太欣賞。或許是有感於武俠小說的水準參差不齊，正好當時太極派與白鶴派於澳門比武爭勝，又受到當時任職《新晚報》總編輯羅孚的鼓勵，於一九五四年執筆寫了第一部作品《龍虎鬥京華》，自此筆耕武俠小說三十年，不曾間斷。《女帝奇英傳》於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連載於《香港商報》，也是梁氏最自豪的三部作品之一，「北派五大家」沒落於四十年代，而梁羽生崛起於五十年代初期，在這舊派武俠小說與新派武俠小說的過度期，梁氏的作品特色當受其影響不少，以下個人將依序由「奇幻仙俠派」 還珠樓主、「社會反諷派」 白羽、「幫會技擊派」 鄭證因、「悲劇俠情派」 王度廬及「奇情推理派」 朱貞木等「北派五大家」，對《女帝奇英傳》內容創作上的啟發，逐一探究。

### （一）「奇幻仙俠派」 還珠樓主對《女帝奇英傳》的啟發

還珠樓主，本名李壽民（西元一九二二—一九六一年），四川長壽縣人；自幼博極群書，穎悟異常，遂有「神童」之目。及長好佛慕道，兼習禪功、武術與命理之學；足跡遍至名山大川，由是胸中自有丘壑，見聞益廣。其所著《蜀山劍俠傳》是一部糅合了神話、志怪、幻想、劍仙、武俠的超長篇章回小說，獲得「神怪武俠小說空前精采第一鉅著」及「武俠小說的百科全書」兩項美譽<sup>24</sup>。梁羽生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，自然從中繼承了不少特色。

舉凡人物名號、真經、秘笈、神掌、玄功、靈藥、異獸、奇禽、怪蛇以及凌空虛渡、千里傳音、陣法妙用等等，五十年代以後的武俠小說家，幾乎無一能不受到還珠樓主的影響。

<sup>23</sup> 見葉黎明《梁羽生真情流露》收錄於「坐擁書城」網站（www.bookbar.net），香港記者葉黎明訪問定居澳洲雪梨的梁羽生，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。

<sup>24</sup> 同註 22，頁一五一。

例如：第十回 中，天惡道人的「腐骨毒掌」，不但毒力猛烈，亦可開碑裂石，雖稱不上「神掌」，也算是一絕；第十七回 中，兩隻金髮狒狒走動靈活，竟不輸一流高手，且尚通人性；第二十四回 中，百憂上人的「金剛掌力」震攝眾人，即使遭多人圍攻，仍遊刃有餘；第二十七回 中，夏侯堅的「斷魂散」竟能讓人死而復生。這些令人嘖嘖稱奇的功夫、靈藥及異獸，或多或少受到還珠樓主的影響，經梁氏的「改造渲染」後，以另一種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。

還珠樓主既然專於章回小說，在回目上必然極為重視，雖然梁氏的《女帝奇英傳》並非章回小說，但他仍持續使用舊派武俠小說中的回目，作為每一段落的開頭。每個回目並非完全抄襲前人的詩句，有許多是作者所自創，雖然並非每個回目都是佳句，但仍是不乏佳作的出現。梁氏雖然喜愛引用古典詩詞，但卻常自行創作，此種勇於嘗試的精神，以值得讓我們學習與敬佩。

還珠樓主學養精深，見多識廣；足跡遍歷名山大川，博聞天地間奇情怪事。梁氏雖然無法如還珠樓主般行腳處處，但知道行萬里路對創作的效用，即使無法親身經歷，卻能閱覽各地的遊記及景觀圖片，以補無法親眼目睹之不足。還珠樓主曾撰有《天山飛俠》一書，但並未創立「天山派」，《女帝奇英傳》中的優曇神尼為尋未婚夫而落腳天山，並在天山授徒及編寫武功秘笈，雖然未明確地開山立派，卻早在之前的《七劍下天山》、《塞外奇俠傳》、《江湖三女俠》、《冰魄寒光劍》、《冰川天女傳》及《雲海玉弓緣》中，即以「天山派」為武學正宗或主流，或許就是受到還珠樓主的啟發而有此舉！

## （二）「社會反諷派」 白羽對《女帝奇英傳》的啟發

白羽，本名宮竹心（西元一八九九—一九六六年），山東省東阿縣人；生於天津，長於北京。少年時期即向報刊投稿，立志做一個新文藝家；曾獲魯迅鼓勵，發表西洋文學譯作多篇。惟因家敗輟學，半生潦倒，為養家活口而晝夜奔忙；做過郵務員、稅務員、校對、編輯、記者、教師、書記以及風塵小吏。這些血淚交迸的慘痛經歷，在他的自傳《話柄》一書

中，都曾留下「不堪回首」的烙印。

一九三八年初，宮氏得好友鄭證因之助，以「白羽」為筆名，於天津《庸報》上發表長篇連載武俠小說《十二金錢鏢》，一舉成名。白羽善於洞察人情世故，並運用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美，道盡社會百態。在其作品中充滿了批判精神，並以社會反諷的手法來寫武俠小說，其實這是有緣故的，白羽在他的自傳《話柄》中曾說：

一個人所已經做或正在做的事，未必就是他願意做的事，這就是環境。環境與飯碗聯合起來，逼迫我寫了些無聊文字（按指武俠小說），而這些無聊文字竟能出版，竟有了銷場，這是今日華北文壇的恥辱！我可不負責<sup>25</sup>。

他的老友葉冷也透露說：

白羽討厭賣文，賣錢的文章毀滅了他的創作愛好。白羽不窮到極點，不肯寫稿<sup>26</sup>。

葉氏對白羽賣文引以為恥之事也敘之甚詳：

可是造化弄人，不教他做他願做的文藝創作，反而逼迫他自搥其面，以傳奇的武俠故事出名；這一點，使他引以為辱，又引以為痛<sup>27</sup>。

梁氏曾自言：

白羽的小說描寫民初各階層人物，因為作者本人涉世極深，寫來細膩，最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看。可是自己受生活經歷的限制，氣質又完全不同，要走「正統」道路嗎？肯

<sup>25</sup> 見白羽《話柄 自序》（天津：正華學校出版部，一九三九年。）

<sup>26</sup> 見白羽《話柄 附錄 白羽及其書》（天津：正華學校出版部，一九三九年），頁三二〇。

<sup>27</sup> 見白羽《話柄 附錄 白羽及其書》（天津：正華學校出版部，一九三九年），頁一一八 一二六。

定不成功，於是只好自己摸索，走一條浪漫主義的路了<sup>28</sup>。

由此可知，梁氏與白羽之間是有其淵源的。武俠小說評論家葉洪生，歸納了白羽對之後的武俠小說家有三點啟發：

- 一、打破「超人武俠」神話。
- 二、開創「武打綜藝」新風。
- 三、首張「武林」之目<sup>29</sup>。

在《女帝奇英傳》中，梁氏並非一味地描寫宮廷間的帝位鬥爭，還加入了老百姓和異族人對時事與國政的看法，企圖由側寫的方式來描繪人世百態，反諷社會現實，提昇了文本的思想層次與文學價值。白羽參考萬籟聲《武術匯宗》<sup>30</sup>要旨，掌握技擊原理，開創虛實相生、奇生相間的「武打綜藝」新風。儘管梁氏對武功的描述不夠精采，但將俠骨柔情的境界提昇，以是非觀念與愛國情操為其基本思想，將人性與愛情較難詮釋的部分滲透於武俠世界中，溫情與摯愛都兼顧到了。在白羽之前，武俠說部只有「江湖」、「綠林」稱謂而無「武林」一詞。自白羽作品問世，始有「武林」說法；其涵義遠較「綠林」為廣，兼及江湖上黑、白兩道。從此「武林」云云遂約定作俗，在武俠小說中拳打腳踢，沿用至今。在《女帝奇英傳》第五回「峨嵋金頂英雄會」中，李逸欲結合江湖人士的力量，在峨嵋金頂上大會群雄，在取得「武林盟主」之地位後，利用眾人的力量來恢復李唐宗室，這裡說到的「『武林』盟主」，自然是受到白羽的啟發了。

### （三）「幫會技擊派」 鄭證因對《女帝奇英傳》的啟發

<sup>28</sup> 見龍飛立《劍氣蕭心梁羽生》，收錄於《梁羽生的武俠文學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一九八八年），頁二六。

<sup>29</sup> 同註 22，頁五二。

<sup>30</sup> 萬籟聲編《武術匯宗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局，一九八九年。）

鄭證因（西元一九一九年），天津人氏，本名鄭汝霈，精通武技，並深諳幫會規矩、江湖門道。早年一度教過私塾，後為生活所逼，遂專事武俠創作；一生成書多達八十八部，但泰半為中篇小說，長篇鉅著殊不多見。鄭氏初寫技擊，直來直往，力求平實，故不為世人所重。及見白羽《十二金錢鏢》，鄭證因曾助其設計第二章的武打場面，竟揚長避短，而能以「武藝文學化」的寫章筆法引人入勝，乃有所悟。

一九四一年初，鄭證因代表作《鷹爪王》於天津《369 畫報》開始連載，故事曲折，佈局嚴謹，波瀾起伏，扣人心弦。其筆力之雄渾恣肆，使全書通體呈現出一種陽剛氣魄；而所敘幫會組織七實三虛，駭人聽聞，尤在姚民哀之上；加描寫武功技擊精到細緻，歷歷如繪，衍創奇門兵器又層出不窮，別開生面，因而獲得廣大讀者的高度評價與認可，終於奠定了鄭證因「幫會技擊派」的宗師地位。

武俠小說評論家葉洪生根據鄭證因作品的風格和典型，分析了其對日後武俠創作的啟示：

- 一、武功兵器多樣化。
- 二、「紙上江湖」虛實並用。
- 三、樹立武林怪傑樣板<sup>31</sup>。

以往的武俠小說中，武功兵器的變化性並不大，鄭證因開創了武功兵器的多樣化。在《女帝奇英傳》中，例如：沾衣十八跌、腐骨毒掌、八步趕蟬、梅花針、綢帶、金針、拂塵、鐵煙桿、袈裟、鋤頭、草鞋等，梁羽生自創了許多武功和兵器，日常用品也可以當兵器，真是令人始料未及。「武林怪傑」的遊戲風塵，身負絕世武功和奇門兵器，《女帝奇英傳》中的符不疑，雖然行事怪誕，卻身負絕技，且在適當時機出面化解危機，實為文本中不可或缺的甘草人物，也可據此看出《女帝奇英傳》受鄭證因影響之跡。

---

<sup>31</sup> 同註 22，頁五四。

#### (四)「悲劇俠情派」 王度廬對《女帝奇英傳》的啟發

王度廬，本名王葆祥（西元一九〇九—一九七七年），北京旗人家庭出身；僅受過初中教育，全憑自學成材。王氏很早即踏入社會，備嘗人世艱辛；曾任教員、小報編輯以及攤販公會文書等清苦工作，對於人情冷暖，有切膚之痛。由是形成其悲劇性格，假筆端以寄慨，亦濡滿淚水，動人心魄。

正由於王度廬寫義慷慨俠烈、寫情纏綿悱惻，而其絕大多數武俠作品均以悲劇收場，乃獨創「悲劇俠情」一派，得享盛名。在其一生所撰二十種武俠小說中，特以《鶴驚崑崙》、《寶劍公釵》、《劍氣珠光》、《臥虎藏龍》、《鐵騎銀瓶》五部曲最具代表性；且流傳廣遠，感人至深。王度廬在寫情方面獨擅勝場，勾勒出人性衝突、心理掙扎、愛恨交織種種複雜情境。由是「武俠」始得以擺脫外在武功技擊的束縛，而潛入英雄兒女的靈魂深處活動，進一步完善了武俠小說的形態與內涵。

《女帝奇英傳》中，李逸和長孫璧、武玄霜、上官婉兒之間的情愛糾葛，充滿了俠骨柔情的氣氛，至於神奇武功、幫會秘辛雖亦不可或缺，卻必以「俠情」為依歸，始相得益彰，引人入勝。「俠骨柔情」乃逐漸取得武俠小說的靈魂地位，主導整個武俠創作發展趨勢，並成為其中最扣人心弦的一環。《女帝奇英傳》中情義兼顧，有慷慨激昂，也有纏綿悱惻，但比較特殊的是，它是梁氏少數以悲劇收場的作品，男女主角中的長孫璧和李逸相繼中毒身亡。通常梁氏的武俠小說都以喜劇收場，惟獨《女帝奇英傳》與《大唐遊俠傳》兩部中的主角，最終皆殞命收場。文本中充滿俠骨柔情，結局又以悲劇作收，由此可見，王度廬「筆鋒常帶感情」，對梁氏的影響不可小覷！

#### (五)「奇情推理派」 朱貞木對《女帝奇英傳》的啟發

朱貞木，本名朱楨元（西元一九〇五—？），浙江紹興人。廿年代後期曾與還珠樓主共事於天津電話局；因見還珠以《蜀山劍俠傳》成名，乃仿其筆調撰《鐵板銅琶錄》及《飛

天神龍》、《煉魂谷》、《艷魔島》三部曲，初未引起注意。嗣後別闢蹊徑，穿插歷史人物寫成《虎嘯龍吟》、《千手觀音》、《七殺碑》等書；復以苗疆邊荒之風土人情為素材，撰《蠻窟風雲》、《羅刹夫人》姊妹作。文筆雋妙而饒奇氣，故事佈局詭秘，尤以推理見長，而自成一家。

武俠小說評論家葉洪生，談到朱貞木對港台新派武俠小說家的啟發作用，歸納為三點：

- 一、打破傳統章回體對仗式回目。
- 二、掀起武俠世界「一夫多妻制」情海波濤。
- 三、神化武功並為「成人童話<sup>32</sup>」定型<sup>33</sup>。

朱貞木首創以文白夾雜的短句、成語或專有名詞分章，不拘一格；加以喜用現代新語詞（如「觀念」、「意識」、「環境」、「計畫草案」等等）行文敘事；梁氏的武俠小說有使用舊回目的習慣，且在文本的敘寫上，極重視文字美感的呈現，雖是文白夾雜，但卻能自創回目與詩詞，與朱貞木喜用現代新語詞有異曲同工之妙。「一夫多妻制」是中國的舊習俗，但朱貞木卻將此習俗融於武俠小說中，使主角大享齊人之福；文本中的確有「眾女倒追男」的影子存在，但卻不太明顯，只因作者多了一份女性自主意識的觀念，而淡化了此種情節。朱木貞的武俠小說較白羽、鄭證因描寫「武打綜藝」之筆法、意構更為浪漫化、神奇化，是最早向還珠樓主「取經」，而將其種種奇妙素材移植到俗世武俠之第一人。文本中男女主角的浪漫情愫隨手可得，雖然在描寫武打的場面上稱不上「神奇」，但身為承舊派武俠小說與開新派武俠小說的關鍵人物，所寫出的「成人童話」已屬不斐。

梁氏受到家學淵源的耳濡目染，許多良師益友的指導和切磋，憑著自身高人一等的領悟力，由舊派武俠小說北派五大家作品中汲取養分，最初雖有模仿之嫌，但終能將各家優點融會貫通，突破了舊派武俠小說漸趨沒落的窘境，或許難免仍存有舊派武俠小說的痕跡，整體說來，他為新派武俠小說開山立派，承先啟後，卻是功不可沒。

<sup>32</sup> 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，北京《光明日報》訪問數學家華羅庚時，他說：「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。」

<sup>33</sup> 同註22，頁五八—五九。

### 第三節 作者個人經驗的影響

上一節中提到，梁氏的外祖父因辛亥革命後，無心政治，便歸隱廣西蒙山，由於本身對棋藝詩詞的愛好，加上家中藏書頗豐，猶如一小型圖書館，因此年幼的梁氏在耳濡目染下，鎮日與書為伴，有了良好的古典詩詞根底。

西元一九一五年九月，陳獨秀創辦《青年》（二卷起改名《新青年》）雜誌，與胡適、魯迅等人，大規模地以道德革新與文學革命為內容和口號，發起新文化運動。這種以啟蒙為目標以批判舊傳統為特色的新文化運動，在適當條件下遇上批判舊政權的政治運動時，兩者便極易一拍即合，彼此支援，而造成浩大的聲勢，西元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，正是這種救亡性的反帝制政治運動<sup>34</sup>。上述這兩種運動的結合，雖要摒棄傳統，但它仍是為了國家、民族、改變中國的政局和社會面貌，既沒有脫離中國士大夫「以天下為己任」的固有傳統，也沒有脫離中國近代的反抗外侮，追求富強的救亡路線。尤其胡適在一九一八年時，撰文暢談節烈、貞操問題，企圖為女性建立新形象，也為新文化運動注入了一股心靈活水<sup>35</sup>。

梁氏出生於西元一九二二年，在梁氏的青年時期，新文化運動與反帝制的五四運動之影響方興未艾，梁氏身為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員，自然受其影響。西元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戰爭一爆發，不論男女、老幼或種族，大家都想為國家盡一份力量。作者居住的廣西省，因位處南方，並未被戰火波及，仍可過著偏安的生活，因而整日迷於尋章摘句，由於家中也算富裕，因此年紀雖輕，卻儼然一派名士風範。此時的梁氏，並不因日子過的愜意而荒唐喪志，飽讀詩書的他，對中國的文化與歷史有著一份特有的堅持，強烈的愛國思想漸漸地催促著他，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，基於滿腹的理想需要去實現，於是他毅然決然地離開家鄉，赴廣州嶺南大學就讀。

在赴廣州投考嶺南大學途中，發生一段小插曲，梁氏忽染痢疾，當時的醫療並不發達，幸虧同行的簡又文教授帶有二顆價格奇昂的美國藥丸，慷慨地拿出來，讓梁氏免受痢疾之苦。當船甫出珠江口時，梁氏詞興一起，即賦詞一闕 木蘭花慢：

<sup>34</sup> 見李澤厚著《中國現代思想史論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一九九〇年。），頁八。

<sup>35</sup> 見胡適著《胡適作品集-貞操問題》（台北：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一九八六年。），頁四七 - 五八。



乙酉秋，余隨馭繁師（按：簡又文）自桂返粵，舟中賦此。

謝西江萬煩，瀉珠海，送歸船。盡洗滌風沙，沖殘塵跡，愁鬱都捐，離亂慣聞鼙鼓，聽潮聲，猶似警頻傳。八載滄桑歷劫，浪花淘盡年。波心月影湯江圓，照澈舊山川，問洪楊故跡，至今遺幾，不付秋煙？百年難得逢知己，避荒山，治學發幽潛。吩咐輕舟且慢，待君遙望金田<sup>36</sup>。

詞中感慨家國興亡之意甚濃，抗日戰爭才剛結束，又逢痢疾之苦，梁氏對家國的歸屬感更趨深厚，後來其作品中武俠與歷史的密不可分，或許在此時已經萌芽了。《女帝奇英傳》中即是以武則天專政為歷史背景，文中圍繞著歷史事件作敘寫，並夾雜著男女之間的情愛糾葛，作者對皇位的正統與否並不堅持，而是重視在位者的能力，能為國家與社會帶來和平繁榮者，就是好的統治者；反之，若為國家社會帶來戰亂顛沛，即使是正統繼位，也是枉然。

一九四九年，梁氏輾轉來到香港，任職於香港《新晚報》。三年後，澳門一場著名的拳師比武，改變了作者的一生。《新晚報》的總編輯羅孚先生，為了延續這股比武的熱潮，於比武的第二天，就以事先的「巧妙安排」<sup>37</sup>，第三天就讓梁氏的第一部連載小說《龍虎鬥京華》見報，沒想到，這一寫就是三十年不間斷。這個永生難忘的經驗，至今令梁氏回想起來仍是意猶未盡，平時侃侃而談的武俠小說，竟能在一天之內就上報連載，原因是作者平日就愛讀武俠小說，而且愛和人交流讀武俠小說的心得。這些人當中，彼此談得最起勁的，就是金庸。兩人是同事，在同一報紙工作天天都要見面的同事；兩人有同好，愛讀武俠，愛讀白羽的《十二金錢鏢》、還珠樓主的《蜀山劍俠傳》等，有共同的話題。兩人的共同興趣不僅在讀，也在寫，當梁氏寫完了《龍虎鬥京華》時，金庸也就見獵心喜地寫起《書劍恩仇錄》來了。時在一九五五年，晚上梁羽生三年。

漫漫三十年，他寫了長長三十六部作品，共計一千多萬字。其中有根據歷史史實而寫

<sup>36</sup> 見龍飛立 劍氣蕭心梁羽生，收錄於《梁羽生的武俠文學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一九八八年。），頁五。

<sup>37</sup> 柳蘇在其所著 俠影下的梁羽生 一文中，羅孚先生在比武的第二天，即預告邀刊登武俠小說以滿足「好鬥」的讀者，梁羽生在半推半就之下，於是開始了他第一部武俠小說連載。

的，也有憑藉想像而虛構的。有人曾經指出他的武俠小說「兼有歷史小說之長」，究竟他所根據的，是正史，還是野史呢？他說：

兩者都有。雖然小說家筆下所創造的歷史未必會有確切的事實根據，然而歷史的真實和文學在歷史上所創造的真實，是有連帶的因果關係的。比如說：郭沫若所著的歷史劇「南冠草」，寫明末清初青年詩人夏完淳的事跡，盡避書內有許多細節是虛構的，但主人翁的性格與身份，卻與他在歷史上的活動與背景相符合的<sup>38</sup>。

正史的記載，必須根據史實按年記實，若有絲毫偏頗，則容易引起非議；而歷史武俠小說則不然，除了以歷史為時代背景外，將歷史人物與作者創造的人物，融合於歷史事件及作者編纂過的史實中，使故事情節更富變化性。因此，即使有些細節是虛構的，只要主角的性格與身分能符合歷史的記載，又何嘗不可！所以梁氏又說：

小說中的「歷史人物」和歷史家筆下的「歷史人物」不同，歷史家要敘述「實在的事件」，如果某人沒有做過某事，那就不能「生安白造」，可是小說中的歷史人物，卻不必每一點都吻合歷史事實，小說的作者可以寫「可能發生的事實」。舉一個例子說，根據正史，康熙皇帝當然並沒有殺死他的父親，可是在小說裡卻是可以這樣寫，因為以帝王陰毒的特性，他殺父親並不稀奇。而且在歷史上，帝王家族骨肉殘殺的事實，真是數不勝數。當然在小說中也不能歪曲歷史，若把秦檜寫成忠臣，岳飛寫成奸臣，那就應受責罵了。但在寫秦檜之奸時，卻可以根據想像，把他奸惡的臉譜，更鮮明的畫出來，例如寫他怎樣和敵國勾結，怎樣算計岳飛等。把歷史通過藝術的安排，把歷史人物刻劃得更具體生動，這就是對涉及歷史人物的創作的要求<sup>39</sup>。

<sup>38</sup> 見尤金 寓詩詞歌賦於刀光劍影之中 訪武俠小說家梁羽生，收錄於《梁羽生的武俠文學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一九八八年。），頁六九。

<sup>39</sup> 同註 36，頁六九 七〇。

的確，武俠小說家筆下的歷史和歷史人物，不必處處與史實相同，如果相同的話，那與讀史書沒有差別。因此，在儘量不歪曲史實的前提下，將歷史人物通過藝術的描述，使其更能躍然紙上，看完敘述之後，彷彿如見其人，就達到了創作的目的了。就如文本中對武則天的描述，在史學家看來可能不甚認同，但在武俠小說家的筆下又何嘗不可！

面對當時許多流行的神怪武俠小說，歷史背景模糊不清，又充斥著血腥暴力，武俠小說家是否要具備良好的歷史修養呢？梁氏的回答是肯定的，他說：

每個朝代由政治變遷到武功兵器都不一樣，因此，作者必須具有明確的時空觀念，纔能避免產生張冠李戴的笑話。此外，地理的知識、文學的修養、宗教的認識，也都缺一不可。換言之，寫武俠小說所牽涉到的範圍是很廣泛的<sup>40</sup>！

在歷史背景上，梁氏自幼即熟讀中國歷史，年輕時又拜得名師指導，對外國歷史也有相當的認識。各個朝代的政治背景都不同，不能前朝今寫，也不能今朝前寫，這都是不負責任的寫法，如文本中的歷史背景是武后專政時代，若不能詳細了解當代的政治背景，那在敘述上必定不盡真實，也會讓讀者產生認知上的錯亂。武功兵器更是經歷朝歷代的傳承演變，不可能古代就有現代的武功和技術出現，這也是需要經過一番考證才能寫的，不能隨意地編寫濫造。因此梁氏曾解釋說：

以地理知識來說，中國地大物博，每個地方都有它不同的色彩與特點，如果我們將太湖的景致搬到西湖去，把桂東山水移到蘇州去，就會貽笑大方了。我個人在下筆時，對於那些不會涉足的地方，必定設法找出有關的遊記和資料來參考，以求真實<sup>41</sup>。

在地理知識上更是要有深入的了解，畢竟東西南北各個方向的景觀都有所差異，甚至隔座山或隔條河景物就不盡相同了。尤其當梁氏描寫到不曾去過的地方時，不能光憑自身的想像來

---

<sup>40</sup> 同註 36，頁七〇。

<sup>41</sup> 同註 36，頁七〇。

描述景物，這樣可能會令人笑掉大牙。如果無法親身經歷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參考相關的旅遊資料與圖片，增加對當地景物的熟悉感，這樣在作描述之時就不會有南北景觀顛倒的笑話出現了。文本中對中原內地的描述，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認識，但對玉門關外的景觀大概就一知半解了，梁氏並沒有因為不曾到過而憑自己的想像去描寫，這樣對讀者來說是相當不負責任的。因此，梁氏在參考了當地的旅遊資訊後，再加以考據一番，務使文本中的描述與實際的景觀差異降到最低，如此用心的做法，不僅作者的地理知識日益精進，讀者也能評藉著文字的描述來一趟「紙上旅行」，由梁氏的敘述，便可知其創作的認真。

在文學修養上更是重要，梁氏既為名士俠客型的武俠小說家代表，本就以筆法優美著稱，間以古典文學根底深厚，在描述時文藝氣息極為濃厚，如第五回中描述「峨嵋天下秀」的山容秀麗：

在月夜下的峨嵋山，美得更是難以形容，群峰挺秀，或如靜女麗姝，或如神僧異丐，岩岫聯屬，盡態極妍。雲海蒼茫，冰輪正滿。峨嵋諸峰，在月光雲氣之下，都好像蒙上了一層薄霧冰綃，神秘、幽邃、寧靜！（第五回，頁86。）

梁氏以精細的筆法和過人的想像力，描繪出峨嵋山的景觀，讀來彷彿置身其中，令人讚賞。本書每回皆有回目之外，更由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及當代詩人的詩句中，擷取適合的詞句，融入情節情境之中，以古典詩詞來寓意，使讀者不僅能讀到內容情節，也能吟詠優美的詩句，增加了閱讀的樂趣。另外，在宗教的認識上，梁氏指出：

高僧此一形象在武俠小說裡常常佔有很重的份量，如果寫作者對於佛經的內涵思想一竅不通，則所塑造出來的形象也必然是乾巴巴的，一點實質也沒有<sup>42</sup>。

當然，宗教的形象並不只有高僧，如文本中的天惡道人、優曇神尼、小和尚等，都是宗教信仰

---

<sup>42</sup> 同註36，頁七一。

下的形象之一。同一種宗教信仰之下，尚可分為多種不同的形象，每種形象的外表各異，表現出來的言行也就更多了；不同宗教信仰，其差異性就更大了，如果不能了解各個宗教的思想內涵，在描述宗教的形象時，可能會出現張冠李戴的情形，不僅貶低了作品的價值，也誤導了讀者對宗教信仰的認知。

除了明確的時空觀念、地理的知識、文學的修養及宗教的認識之外，梁氏還提及了另一個重點：

如果要求更嚴格的話，武俠小說家對於四裔學<sup>43</sup>也必須有所認識。如果寫作者對於四裔學毫無認識，那麼，在描寫到邊疆民族的生活時，也只有輕輕帶過，馬虎了事<sup>44</sup>！

武俠小說家如果能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況、風俗習慣、歷史變革等有所研究，當可使作品生色不少。梁氏對中原民族的生活狀況、風俗習慣、歷史變革等皆了然於胸，但對邊疆的少數民族也不應該忽視，畢竟武俠小說的世界是無所不包，如果只在單一區域及民族之間作發展，將令人感到單調與無趣。因此，梁氏重視「四裔學」的觀點是正確的，文本中男主角李逸因無心政治而歸隱塞外，梁氏若不能對當時塞外民族的生活狀況、風俗習慣、歷史變革等有所了解，只憑自身的想像來描述，甚至一筆帶過，對梁氏來說，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，因而梁氏格外重視。

梁氏既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師，本身是否具有武功而武技驚人呢？梁氏坦然承認道：

啊，不！我本人就是不懂武術的。實際上，如果我們將真實的武技搬入小說裡，反而會顯得很沈悶。好像早年的武俠小說家鄭證因，就是精通武者，他的小說「鷹爪王」對於武術的描寫就很詳盡細膩；然而，許多人讀了都覺得很枯燥很無味。監於此，

<sup>43</sup> 梁羽生曾說：「如果要求更嚴格的話，武俠小說家對於四裔學也必須有所認識。所謂『四裔學』，是有關邊疆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況、風俗習慣、歷史變革等。」原文見尤金 寓詩詞歌賦於刀光劍影之中 訪武俠小說家梁羽生，收錄於《梁羽生的武俠文學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一九八八年。），頁六九。

<sup>44</sup> 同註 36，頁七一 七二。

一般武俠小說家在描寫及武技時，都是憑藉想像來加以渲染的<sup>45</sup>！

其實，梁氏對武術僅是一知半解，而武技更是一竅不通，但或許因為如此，使得梁氏獲得了更寬廣的想像空間，不似鄭證因那般，因為通曉武功，在描寫上反而詳細的近乎枯燥。想像的渲染可使得情節更加精采，但關於武打過程及人身經絡，究竟梁氏是參考什麼呢？他說：

我只是翻翻拳經，看看穴道經路圖，就寫出自己的武功了<sup>46</sup>。

由此可知，梁氏本身是不具備武功的。鄭證因在《鷹爪王》中，對武技的描寫靈活細膩，反而令讀者感到枯燥乏味。因此，梁氏的言下之意，似乎是說懂得武功的人，就好像「當局者迷」一般，無法跳脫出來；而不懂武功的人，就彷彿「旁觀者清」似的，在描寫武打場景時，反而沒有思考上的束縛，翻看拳經和穴道經路圖，再加上自己的想像來渲染情節，較精通武功者更能寫出精采的武打場景。梁氏本身也是棋術高手，懂得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」的微妙之處，寫起武俠小說來自然得心應手，大快人心。

梁氏在多部作品中，都是以天山為背景，在文本《女帝奇英傳》中，男主角李逸偕長孫璧也是歸隱於天山，是否對天山「情有獨鍾」？作者曾笑著說道：

天山給人馳騁幻想的空間，又有維吾爾歌舞，又有刁羊，民歌，讀者看得很有趣，也多少能增加點地理知識。好像我在小說中描述古代歷史山川風物時，我都是經過嚴格考據的。譬如寫天山，我不知翻閱了多少天山遊記<sup>47</sup>。

一貫以「天山派」為武學主流，自《七劍下天山》起，如《塞外奇俠傳》、《江湖三女俠》、《冰魄寒光劍》、《冰川天女傳》、《雲海玉弓緣》、《冰河洗劍錄》等系列作品，無不以「天山派」

<sup>45</sup> 同註 36，頁七二。

<sup>46</sup> 見柳蘇 俠影下的梁羽生，收錄於《梁羽生的武俠文學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一九八八年。），頁四〇。

<sup>47</sup> 見愛薇 刀光劍影三十年 訪梁羽生，收錄於《梁羽生的武俠文學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。），頁八十二。

武學為正宗、主流而貫穿各書。雖然在《女帝奇英傳》中對天山派的著墨不多，但優雲神尼定居於天山，於天山終其一生，其徒弟裴叔度也未回中原，「天山劍客」的印象已深植人心，因約有「天山派」的影子出現，這種獨沽一味的寫法，實為武俠小說所僅見，也是作者自身對邊疆風情的喜愛經驗影響所致。

梁氏自幼即有良好的生活環境，家學淵博，加上自身對古典文學的熱愛，舊文學的根底相當扎實。青年時又拜簡又教授為師，與饒宗頤教授亦師亦友，對梁氏日後的武俠小說的寫作功力來說，更是錦上添花。在明確的時空背景、地理的知識、文學的修養及宗教的認識等四個方面，作者有過人的堅持與理念，甚至本身對「四裔學」的嚴格要求，更促使了其武俠作品中以「天山派」為武學正宗、主流的特色，在武俠文學中獨樹一幟。

基於梁氏個人經驗的影響，《女帝奇英傳》中的人物充滿了名士俠客的風範，結合歷史與武俠發思古之幽情，甚至對武后專政時代的政績褒多於貶，以側寫的觀點來說明，在位者不論男女，只要其施政利於民，就應該受到肯定。文本中的回目式標題，再夾雜古典的詩詞，不僅增加了讀者閱讀的樂趣，也介紹了古典文學之美。在中國、台灣及港澳，我們每天接觸的語言與文化都是中文居多，但在海外的華人社會則不然，有的國家甚至規定某些場合禁說華語，因此，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：「梁羽生小說之所以受到歡迎，原因之一是它迎合了海外許多讀者渴求認同民族文化的心理。」